

为和平“发声”

——新中国成立前后许德珩二三事

陈剑锋

许德珩是我国著名的爱国人士，是九三学社创始人和杰出领导者。新中国成立前后，许德珩一直在为和平“发声”，为新中国的成立和政协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政协成立75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回忆许德珩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二三事，以史为鉴、展望未来。

创建九三学社 为和平“发声”

▶ 许德珩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维护其独裁统治，极力抢夺胜利果实，准备发动反革命内战。看透这点的许德珩开始为和平“发声”。

1945年9月3日，日本签字投降。这一天，许德珩等人在重庆青年会大厦举办“民主科学座谈会”庆祝胜利。会上有人提议，今天日本签字投降的日子，“9·3”这个数字意义重大，而“民主科学座谈会”这个名称政治意义不强，应当修改，于是大家便展开了讨论。最后，为了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许德珩等人决定将会议名称改为“九三座谈会”，并成立了“九三学社筹备会”。

1946年5月4日，还是在重庆青年会大厦里，九三学社举行成立大会，许德珩报告了具体的筹备过程，与会同志发表了自由演说，他们一致指出：武力不能求得统一，东北及中原的内战必须立即停止。大会宣布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在《双十协定》中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坚决响应中国共产党在政协会议上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明确指出任何党派不得有任何违反停战协定、政协决议的行为。

自此，九三学社正式登上了中国政治的历史舞台，明确了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的正确政治方向，以实际行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中的坚强力量。

响应“五一口号” 再为和平“发声”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中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就是“五一口号”。5月5日，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联名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中共毛主席电》。九三学社在北平闻讯后，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决议，拥护“五一”号召。因身处国民党统治区，无法公开发表意见，直到北平解放前夕宣言才得以公开发表。周恩来曾指出：“九三学社是在抗战后期成立的，在民主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并成立了‘五一’号召。因为当时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不能公开发表意见，所以一直到北平解放时才公开活动。”

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见大势已去的傅作义请许德珩、徐悲鸿、周炳琳等20多位学者聚会，商讨北平局势。学者们一致认为北平问题要和平解决。许德珩也积极发声，促进了傅作义接受和平解放北平的主张。21日，傅作义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签署《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十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万人空巷，欢庆北平解放。在此期间，许德珩与30位民主教授一起发表宣言书，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响应毛泽东的八项和平主张，拥护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5月26日，许德珩等人在巴黎参加完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后回到北平，立即进入到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中。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举行，北京大学教授许德珩以民主教授身

份参加会议。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授意下，许德珩与几位同志署名撰写了《九三学社概要》，提交给会议代表。19日，会议正式确认九三学社为中国民主党派，为参加新政协的单位之一。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许德珩作为九三学社首席代表参会，并在全体会议上作了发言。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通过北平为新中国首都，并改名为北京，还规定了各项基本政策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许德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热泪盈眶！

拥护抗美援朝 三为和平“发声”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经济建设，但是，一件危及国家安全的事情突然爆发，让刚成立的新中国又面临艰难抉择。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从其全球战略和冷战思维出发，作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8月，许德珩与郭沫若、李立三、高崇民等人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代表团的名义赴朝鲜慰问。两个月后，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朝中边境。侵略美军飞机多次轰炸中国东北

边境地区，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我国安全面临严重威胁。10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在毛泽东主持下进行多次、反复讨论后，最终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两日后，毛泽东在怀仁堂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举行会议，讨论中国援朝问题。许德珩代表九三学社表示，坚决拥护党和政府抗美援朝的决定。会后，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抗议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11月底至12月初，九三学社召开建社以来的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中心议题就是抗美援朝和加强统一战线工作。许德珩在致开幕词时指出，抗美援朝是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工作，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并号召全社社员准备随时贡献一切力量，为保卫和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朝军队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对手，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新中国最终用伟大胜利捍卫了国家安全，保卫了中国人民和平生活，稳定了朝鲜半岛局势，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

回望过去，眺望前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今天，我们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以团结凝聚力量，以奋斗铸就伟业，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壮美华章！

（作者单位：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院）

人仍不肯散去。在群众要求下，只好一再扩大，一直增加到招收17个班、1000多名学生。”

受到如此欢迎，和较高的办学质量是分不开的。在很多青年看来，九三学社专家学者多、知识分子多，办学值得信赖。九三学社南京市委会开办的青年夜校，各门课程的师资，主要由南京各高校的九三学社社员兼任，他们都是讲师以上的高年资教师，注重教学效果，很有吸引力。有学员说：“任课老师都是高等院校的，很有水平，教学质量一定高。”还有的学员说：“（这个班）学费比其他单位收得低。”1986年上半年，该夜校招收了4个班，下半年就增加到8个班，共441人次。学员中，21-30岁的青年占比超过66%，他们学习热情很高，有的家住郊区，离学校超过20公里；有的家住长江北岸，上课时要在城内借宿。不辞劳苦、勤奋努力，是那个时代大部分青年的写照。

除了学历教育，还有不少青年是奔着提升工作技能和业务水平来夜校学习的。九三学社南京市委会的英语辅导班中，有不少是金陵饭店、南京饭店以及外贸单位的工人、干部、工程师，他们反映：“课程对我们提高业务水平有很大帮助。”

民主党派办青年夜校，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民主党派职能的完善，它早已成为过去式。但在新时代，民主党派依然可以利用自身资源，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面向青年开展夜间讲座等活动，以新形式延续青年夜校。

（作者系九三学社江苏省委员会党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黄炎培的三部“来作”

王荣 王抒滢

文人轶事
WENRENYISHI

近代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社会活动家黄炎培，一生笔耕不辍、著述丰硕，其中《抗战以来》《延安归来》《八十年来》三部著作，因都有一个“来”字，被称为他的三部“来作”。

黄炎培著《抗战以来》由国讯书店1942年5月初版发行，正文收录了《抗战以来》《抗战问答》《心》等30篇杂文。九一八事变后，黄炎培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创办《救国通讯》，宣传爱国主义，组织上海市民维持会（后改为上海地方协会）支持淞沪会战；在重庆期间，迁建工厂学校，动员工商界教育界捐款捐物支持抗战，发起成立民主政团同盟，促进国共合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发挥积极作用。

1945年7月1日至5日，黄炎培、褚辅成、冷通等6名国民参政员赴延安访问。回到重庆后，黄炎培写下《延安归来》一书，并于同年8月在重庆国讯书店出版发行。该书以一名民主党派人士的视角，真实记录了其在延安亲身感受到的民主氛围，介绍了一个真实的延安，一个令人感到亲

切、有着光明前途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该书初版2万册，几日内便销售一空，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国民党当局因而对此书进行查禁，却意外地在国统区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拒检运动”。

《八十年来》系自述体回忆录，是黄炎培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历史阶段的真实记录。全书记载了黄炎培与孙中山、李大钊的交往；1945年7月访问延安时，与毛泽东的谈话；针对旧教育的弊端，提倡职业教育；1917年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等重大历史事件。《八十年来》于1964年10月完稿，1982年8月由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发行。

1963年2月20日，黄炎培给毛泽东写信并附上《八十年来》上卷打印件，封面上的“八十年来”“上卷”“前言”“第一时期”“第二时期”等全部文字都是黄炎培用毛笔书写的，在封面的右上方，黄炎培书写的“毛主席赐教”五个大字尤为醒目。此信和《八十年来》上卷书稿（书中留下了毛泽东阅读时标注的墨迹），现收藏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

文人轶事
WENRENYISHI

“体育校长”张伯苓

王剑

“南开之父”张伯苓是现代教育的奠基者，他提倡德智体美并进的全面教育，尤其重视体育训练，被人们尊称为“体育校长”。

从教之初，张伯苓就非常重视体育活动的开展，曾自行设计制作体育用具。南开创立后，张伯苓制定的三大政策中，列在首位的便是体育。在南开中学，体育课为必修课，而且是“强迫体育”。每天下午三点半，教室门全部锁上，每个人必须到操场参加锻炼，达不到测试标准者不能毕业。

南开是私立学校，经费主要靠募捐得来。但张伯苓对体育的投入却从不吝惜。上世纪20年代中期，南开在校生不过千余人，却有15个篮球场、5个足球场、6个排球场、17个网球场、3处器械场，以及2个400米标准跑道的大运动场，各种体育轻器械一应俱全。张伯苓重视体育的程度可见一斑。

张伯苓曾言：“不懂体育者，不可

以当校长。”每逢南开的教职工运动会，张伯苓都要带头参加，还曾荣获过百米赛跑的第一名。他经常与学生一起踢足球，带领学生参加比赛，由此赢得了“体育校长”的美誉。

他在创办南开学校之初，就率先将奥林匹克教育写入体育教学大纲；最早发出“奥运三问”；最早发起创建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最早参与发起了“远东奥林匹克运动”。

1932年，短跑运动员刘长春拟以中国运动员身份参加第十届奥运会。张伯苓获悉此消息后，积极联系国际奥委会为刘长春报名。在得到同意答复后，张学良捐助了8000银圆，资助刘长春前往洛杉矶，正式开启了中国人参加奥运会的历史。

1945年，张伯苓组织召开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议，决定申办第15届奥运会。虽然未能如愿，但是中国有了第一次申办奥运会的尝试。

吕思勉学史

周星

文人轶事
WENRENYISHI

吕思勉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出生于常州的一个书香门第，所以很早就开始学历史了。

8岁那年，吕思勉母亲程夫人亲自为他讲解《纲鉴正史约编》。后来在私塾先生要求下，他开始点读《纲鉴易知录》。到了14岁的时候，正好是戊戌变法那一年，他已经能写出科举考试的文章了。科举制被废除后，吕思勉花费了半年时间读完了《通鉴辑览》。从他所看的书籍来看，他在少年时就已了解中国历史的概貌了。

到了15岁，在父亲的带领下，吕思勉开始阅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和陈鹤的《明纪》。这时，他读书非常勤快，读这3部书时，两天就能读完14卷，受到了父亲的高度肯定。接着，他又读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日知录》和《十二史札记》，从整体上了解了中国古代学说的源流派别以及各种重要著作的内容大要。后来，吕思勉又用五色笔抄录《史记》《汉书》《后汉书》评点本和

《三国志》。

学完前四史，他发现自己收获很大，对历史的兴趣更加浓厚了。于是，他趁热打铁，又一口气读完了《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等诸多史书，成为当时史学界的青年才俊。

在21岁那年，他跟随时著名的元史专家、教育家屠寄学习元史。在屠寄的影响下，他又读了《辽史》《金史》《元史》，并补读了其余各类史书。两年后，二十四史就全部读了一遍。后来他回忆道：“人家说我正史读过遍数很多，其实不然。我于四史，《史记》《汉书》《三国志》读得最多，都曾读过四遍；《后汉书》《新唐书》《辽史》《金史》《元史》三遍，其余都只两遍而已。”

吕思勉早年虽读过大量史籍，在史学方面已具有深厚的功力，但他一直非常谦虚。其实，早在21岁之前，他所读的史籍就已经不是一般治史者所能读完的。所以，史学大家顾颉刚评价吕思勉为“全国中精熟全史者唯此一人”。

文人轶事
WENRENYISHI

冰心穿旗袍坐花轿

刘建东

冰心在《我的老伴——吴文藻》一文中说：“我们的婚礼是在燕京大（今北大）的临湖轩举行的，1929年6月15日是星期六。”

在江阴夏港老家，吴文藻的父亲吴煊若与人合伙开了个小米店。为方便装运货物，吴家在夏港河边，万安桥附近建了个小码头，人称“吴家码头”。冰心第一次来夏港就从吴家码头上的岸。

当年7月间，吴文藻父母给吴文藻的信中表示，老家在夏港镇也是有头有脸的大族，对于冰心这样的名门望族、大家闺秀必须隆重迎娶，大摆新婚宴席。于是，吴文藻按信中所说要冰心在婚宴当天坐大红花轿、着中式礼服在夏港露一次脸。当时的时代背景，五四新文化运动才10年，诸多知名文化人都以新文化斗士的面貌示人，冰心当然不肯着罗裙坐花轿。为此小两口还怄起了气。

1929年8月初，吴文藻和冰心在上海首先拜见了冰心的父母亲，并谈及了冰心去江阴夏港归家的事。刚当上老丈人的谢葆璋比较满意吴文藻这个女婿，便调停此事，告诫冰心

说：“值此新旧文化碰撞之际，何不中西合璧，两全其美呢？”

8月初，冰心和吴文藻从上海坐火车到无锡站，然后搭乘乌篷船从无锡出发，经锡澄运河进入夏港河返回家乡，中午缓缓驶入吴家码头。万安桥两岸聚集着吴家的亲戚和附近的村民，可谓是人山人海，大家争相来看北京来的著名女作家、新娘子冰心。吴家迎亲的花轿也早已等在那里，其实码头到吴家也就300多米的道路。乌篷船在吴家码头停靠，爆竹声阵阵响起，吴文藻和冰心携手上岸，只见冰心中等身材，头上剪成短发，上身穿短白背心，内穿开衩旗袍，长得端庄秀丽。吴文藻和冰心上岸后，按当地的风俗冰心被扶进花轿中，然后热热闹闹地抬到了吴家。

吴家的亲朋好友均已到齐，只等新郎新娘来到后开筵。冰心在爆竹声和人们的欢呼声中走出花轿，吴文藻与她一起走过红地毯进入中堂。大家先吃糖水“团圆”，表示甜甜蜜蜜、团团圆圆，然后喜宴正式开始。筵席共有20多桌，隆重热烈，吴文藻和冰心很是高兴。

九三学社办青年夜校

纪习尚

白天到单位打卡上班，晚上到夜校充电学习，最近，青年们青睐的“青年夜校”频频出圈。其实，改革开放之初，青年夜校也曾风靡全国，只不过和现在的“软课程”相比，学历考试辅导、科技英语、工商企业管理等“硬课程”在当时更受欢迎。

九三学社依托自身科技人才集中的优势，呼应时代要求，也曾开办一系列的青年夜校。

1977年10月，国务院宣布恢复高考；1978年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科学的春天到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此时的中国需要大批有知识、有技能的人才，而经过了十年蹉跎的青年普遍文化水平不高，渴望提升知识和技能。

1979年10月，九三学社时隔21年再次召开了全国社员代表大会，社的各级地方组织也在这一时期陆续恢复活动。摆脱了禁锢和束缚的九三学社社员，盼望能在中共党委和九三学社组织的领导下，围绕四化建设、改革开放、两个文明建设等中心工作，为社会提供智力开发、科技咨询等服务。而包括夜校在内的各类培训班，最能满足青年的需要。

据统计，截至1988年，九三学社地方组织共举办各种函授、培训班1691个，学员107018人。由于大部分青年已经踏上工作岗位，白天没有时间上课，这些培训班中，很大一部分要在晚上上课，是名副其实的夜校。

提升学历，是20世纪80年代青年最迫切的需求之一。为此，国家设计了多种通道，除了普通高考，还有高等教育自学考试（1981年）、电视大学（1982年）、成人高校（1986年）入学考试等。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想考试过关已离开校园多年的青年来说并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学历考试辅导班很自然地成为夜校的主打课程。

九三学社安徽省地方组织创办的“合肥青年夜校”就是一个例子。1984年，这所夜校聘请高校和市属中学的优秀教师，举办多种类型的文化补习班，很受欢迎。1985年，他们又计划新开两个教学点，主要面向“打铁升级”的青年。当年1月，他们在《合肥晚报》刊登了名为《九三学社合肥青年夜校新开九中三十八中教学点招生》的长篇广告，招收高教自考班150人、高考补习班135人、成人高考班等150人、电视大学补习班100人。上课时间都安排在晚上，比如高教自考班每周有3晚次、电视大学补习班每周有5晚次，每晚都是3学时。青年夜校的费用，每月为6-8元，大约相当于当年平均月工资的8%。有抱负的青年，把大部分的业余时间和部分收入，贡献给了夜校；收获到的，是烫金的学历证书和个人的提升。

九三学社开办的青年夜校非常火爆。1985年1月的《九三学社为四化服务工作经验交流会侧记》一文曾引用九三学社安徽省委会一位同志的话：“中文、财会等3个专业招生，消息传出，凌晨就有人顶着凛冽的寒风排队报名。原来只准备招收6个班，但不到中午名额就满了，没报上名的